

第五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以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在北大营和沈阳城（即九一八事变）。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轻易地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对日本妥协，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则更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进攻上海、侵占热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直逼北平、天津。1935年夏，更以吞并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直接目的，一面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军事威胁，一面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于6、7月间相继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还计划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自治”的要求。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的共同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多次发表了抗日宣言和主张。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不分党派、信仰、阶级和职业，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1月28日，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2月9日，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即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1月，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会议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开始了与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将领就联合抗日问题的接触。这时的蒋介石尚无心抗日，更未放松“剿共”和压迫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

1936年10月，日本增兵入侵绥远，而蒋介石却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调动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进攻陕甘红军。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扣留了蒋介石，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兴起。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共广东省委也接着发出了通告和宣言，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1931年底，广州大中学举行了示威游行，向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政府对日本宣战。接着，广东各界民众抵抗日本侵占东三省大会召开。这些消息传到北海后，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海地区青年学生首先起来响应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民众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标语。从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帷幕。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鼎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一二八事变后，合浦一中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组织学生约600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声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北海各小学师生也组织大批宣传队走上街头，走向农渔村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控诉日军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捐献慰劳品和慰劳金给第十九路军。合浦一中还组织了纠察队，到各商店检查，严禁日货出售；配合码头、海员、驳船、搬运等工人控制港口，查缉日货。一旦听到第十九路军打了胜仗的消息，以赵世尧为首的学生们还买来鞭炮燃放，

以示庆贺。北海的小学生也组织起来进行义卖（卖花）劝捐、写慰问信、制慰问袋，慰劳上海抗日将士。这时大街小巷都流行着一首《抵制日货》的儿歌，歌词是：“走私货真便宜，奸商人贪小利，可是我问你的，卖了一匹布赚了几毛几？要知敌人拿了你的钱，立刻变成他的枪弹子，一颗颗、一颗颗都是打在你的心窝里。”小学生们唱着这些通俗易懂的歌曲，穿街走巷，发动群众抵制日货。

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都是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策源地。在合浦一中，由对待抗日救亡运动不同态度而形成的进步和反进步两种势力斗争十分激烈。一种是以进步教师和学生为首的主张走出社会、宣传动员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势力；另一种是以反动体育协进会为代表的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投降主义势力。1933年，为了彻底挫败投降主义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争取更多的学生投入抗日洪流，趁合浦一中学生会改造的机会，以赵世尧为首的进步学生发挥读书会的核心和骨干作用，派代表深入各班去做工作，争取中间派同学支持，在公开场合与投降主义言论进行辩论，驳斥他们的投降主义言论。结果进步学生得到全校同学的支持，学生会掌握在读书会骨干分子手中，从而促进了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学生会的推动下，成立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更广泛地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救国会下设“日货登记处”和“检查日货纠察总队”，由合浦一中学生会的苏翰彦（苏觉民）任登记处主任兼纠察总队队长。在“救国会”的统一部署下，全市对各商店出售的日货进行登记，一律禁止出售日货。纠察队组成若干小分队，分乘小艇，轮流到港口检查巡逻，遇到货船出港，即进行例行检查。若查出日货，立即没收，由“救国会”组织当众焚烧。从而将最初零散的自发性抗日活动统一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组织、有部署的全民性抗日活动。这样，不但壮大了抗日救亡运动声势，而且能够争取更多的人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为声援和支持北平学生发动的抗日爱国运动，合浦一中学生自行停课，并在学生会负责人赵世尧、苏翰彦等的发动下，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联合北海各小学师生组织数千人上街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合浦一中出发，经文明路、中山路、珠海路等主要街道，沿路散发传单，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结束后，通过《快邮代电》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他们还以印发《快报》的形式传递北平及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信息，鼓舞北海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使北海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北海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势头发展迅猛，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加紧镇压学生的抗

日运动。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密令各校对学生严加管教，对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廉州中学、合浦一中等校都列出了开除进步学生和解聘进步教师的名单。但是，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的学生在由杜渐蓬率领的“中山大学学生返乡抗日救国宣传队”的声援和帮助下，一边组织更大规模的联合，协商筹备“合浦县学生救国会”，派宣传队下到边远农村、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边进行与投降顽固派的斗争。经过斗争，北海青年学生终于挫败了反动当局妄图清洗学生运动骨干分子，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使北海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

北海青年学生在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北海声援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根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0日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指示，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北海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广泛传播与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

“绿波”书社和“未名社”读书会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他们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但是，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以为通过种种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就可以彻底消灭左翼文化运动。然而，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左翼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在“围剿”中被消灭，反而迎着迫害的狂风恶浪，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顽强地发展起来。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通讯等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在北海，国民党当局似乎得了恐“共”症，对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大肆封杀，残酷地迫害和镇压左翼文化运动，北海部分追求进步的青年曾一度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但在左翼文化运动以及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一批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和学生，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或组织起来阅读进步书刊，尤其是被禁的革命书刊，逐步形成一个以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在共产党员指导下秘密组织的书社、读书会，逐步地、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

1929年上半年，合浦一中春季班受大革命影响的进步学生赵世尧、傅劲材、黄铸夫（黄

钟、黄裕兴)等,秘密地以交朋友结拜兄弟的形式,组成进步的读书小组,学习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以及进步的文学作品,利用《我们的旬刊》(学生会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9年秋,合浦一中从广州请来一批进步教师:杜君恕、杜君慧两姐妹,冯道先和彭秩芬。杜君慧是留日学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冯道先是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广州的合浦县闸口乡山背子村人(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推荐进步书籍,开展进步思想教育。冯道先目睹和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从实践经验中体会到,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实现思想解放,才能明确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方向。于是,他在北海率先办起专营进步书籍的书店“绿波”书社,向北海的青年推介进步书刊,介绍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

“绿波”书社经营着由上海和广州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各类社会科学类书籍,如《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新青年》以及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的文艺小说和作品。合浦一中的学生是绿波书社的主要读者。这时比较激进的赵世尧、冯德(冯廉先)、苏翰彦、黄铸夫等是绿波书社的常客;杜君慧、杜君恕等也常到绿波书社翻阅书报杂志,她们还多次带领学生到“绿波”书社参观,给学生们介绍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和著作。社会上也传言,说“绿波”书社是共产党开办的书社,卖的是共产党的书,从而引来了大批慕名而来的读者。

1931年至1932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北海的抗日文化也逐渐兴起。“绿波”书社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激发学生爱国、救国热情。但是,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文化运动进行了迫害和镇压。国民党北海警察局多次派人到绿波书社抽查,企图封查书社和逮捕阅读进步书刊的人员,但每次都因冯道先机警和及早准备,没被搜出什么证据。冯道先通常将一些进步色彩过浓的,或明显宣传共产党主张的书刊收藏起来,个别传阅给他认为可信赖的进步青年学生。

1932年,冯道先因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绿波”书社停办。但绿波书社对北海人民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影响深远。冯道先对北海青少年早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海许多进步青年后来之所以办读书会,走上了革命道路,“绿波”书社进步书籍给他们的影响起到了很主要的作用。

1932年秋,赴广州求学的合浦一中学生赵世尧带着一批在广州购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包括《通俗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概论》等)以及《读书杂志》中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的论战材料等回到北海,与其同学冯德、黄铸夫、傅劲才、王文崑、李俊生等商量,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道理,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抗日。并把各班喜欢读书的进步同学尽可能吸收进来,使更多的同学都来读进步书籍,在学生中成一股进步力量。读书会取名为“未明社”,意为“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需要战斗到天明”之意,表明了青年学生们追求真理,为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决心。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未明社”对外称“未名社”。在这里青年学生们不但读进步书刊,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常常谈论时局,讨论形势,参加由上海左翼人士发起的“中国社会性质和

革命问题”的大辩论。“未名社”除了吸收本校各班进步同学外，还吸收已毕业的或停学的校友以及社会上的进步青年，也发展一些华侨及邻县的青年学生入社。“未名社”还设立“合浦一中书报代售处”，以此名义与上海各进步书店联系，从而与上海的党中央出版局发行科赵文卿（以后才知道是王均予）接上线，他用各种假名及不同地址寄来党的秘密出版物，如《红旗》、《斗争》、《中华苏维埃成立宣言》、《八一宣言》、《红军捷报》、《中国论坛》等刊物和小册子，作为读书会的教材或学习资料。此后，赵世尧、黄铸夫等就利用通信和书报发行的形式，与上海党组织的有关人员建立起秘密的经常的联系，接受他们的指导，直至1935年。

1933年春，合浦一中学生会改组，经过进步学生的积极活动，全校班代表会议推选赵世尧、苏翰彦、罗绍周为学生会常务理事，主持全校学生会工作，使学生会掌握在“未名社”读书会成员和进步学生手中。学生会发动和组织了许多学生参加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学生会也通过在合浦一中办的书报代售处，发动学生订阅和购买《生活周刊》、《生活知识》、《中国论坛》及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阵地，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秋，“未名社”在合浦一中成立“新哲学研究会”，发动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压制学生读进步书刊和阻碍学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种种反动措施。

“未名社”读书会是北海青年学生中第一个有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它不但团结了要求进步的青年，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北海中共干部的培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群众性读书会活动的广泛兴起

在“未名社”读书会骨干成员的影响下，北海青年学生的读书会活动蓬勃开展。北海、廉州的主要中学都建立了读书会组织，甚至有的中学每个班级都建立了读书会。1934年，廉州中学（广东省第十一中学）由李英敏（何世权）、何承蔚等发起组织“艺宫学术研究会”，以学术研究作掩护，开展学习研究社会科学、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活动。随后由杜渐蓬、张进煊、邹瑜（邹优俞）等牵头，成立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艺宫”的骨干分子参加这个读书会，由张进煊拟订学习提纲，然后编为若干小组进行学习讨论。学习的课程有《唯物辩证法入门》、《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另外还有“神灯”等读书会（朱兰清组织）。与此同时，在合浦一中也先后成立了“静励斋”（庞自组织）、“朝阳”[林朗天（林昊章）组织]、“吴家园”（利培源、郭芳组织）等读书会。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读书会组织逐渐由城市发展到农村，由秘密、半秘密状态向公开展开。1934年以后，合浦的西场、公馆、南康等地也都相继有了读书会组织。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几乎各班都成立了读书会。全国抗战开始后，有些青少年还以能参加读书会而自豪，常常腋下夹着一两本马克思或列宁的著

作穿街走巷，以示进步。这些读书会都是以自拟题目，集体学习，相互讨论来展开活动的。“未名社”和“艺宫”的马

克思学习小组，常常由赵世尧和张进煊根据他们在广州学习的内容或从《社会科学讲座》内选出一些题目（有关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供学习小组成员自行阅读寻找答案，然后大家各自谈体会。有时他们也将上海邮寄来党的文件或党的活动消息，其中有《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军捷报》等，印成传单，秘密散发。党的文件在北海传播，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震动，也给北海人民极大的鼓舞，他们都相传，中共组织还在北海。

北海群众性读书会活动的广泛兴起，表明北海地区青年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虽然是自发性质的群众性运动，但对于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广泛传播，为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央领导对北海地区的读书会活动以高度评价，1938年至1939年间，在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曾两次表扬合浦党的工作，他赞扬合浦党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较成熟的组织^[1]。正是由于有进步读书会的基础，1938年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恢复后，便迅速发展，仅两年间，北海地区党员数就超过200人，廉州中学一些班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2]。

社会主义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

北海群众性的读书会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北海得到广泛的传播。北海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耳闻目睹以及自身的经历中，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进行对新文化、新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改造社会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左翼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目的是引导人民认清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状况的方法和途径。这场辩论波及到京、津、沪和穗，引起各地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1932年，赵世尧在广州求学期间，接触到登载有“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专辑，促使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将主要精力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赵世尧回到北海后，他与同学们组织的“未名社”读书会的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进行“中国社会性质”的学习和讨论。按照《读书》杂志（艾思奇主编）刊登的问题，大家围绕中国是个什么社会、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各自翻阅资料，然后展开讨论，讨论异常踊跃热烈。对中国社会性质论争中流行的两种对立观点，即以刘梦飞为代表的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是当前的争取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将来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以刘镜园和胡秋原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观点进行对比和分析。最终统一结论，赞成刘梦飞的观点，并将体会写成文章寄往《读书》杂志社，参加大辩论。此后这场辩论波及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各个班级，大家就各人不同的理解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意见不一，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观点是共通的。从而引发了北海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思潮。这个思潮的表现是：(1)群众性的读书活动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普遍被民众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已开始深入人心。(2)青年学生对复古读经和实行奴化式的法西斯教育开始了抵制和反抗。(3)新思想和新文化已在社会上传播。

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是否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北海进步青年学生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

30年代前期也是北海青年思想最为活跃时期，他们不但努力追求新事物和新思想，而且努力传播新事物和新思想。为了表达他们对新事物追求和理解，常常通过各种各样的油印小报、刊物或办夜校来达到表现和宣传的目的。自1932年由“未名社”出版的第一份小报《缪丝》开始，北海各读书会和进步群众组织相继出版了《神灯》（“艺宫”学社出版）、《朝阳》（“朝阳”读书会出版）、《群光》（“静励斋”读书会出版）等有着很强影响力的会刊。这些刊物不仅刊登学习心得、体会，发表白话诗歌和小说，还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通俗讲话。在这样的思想影响和熏陶下，这一时期北海青年的政治气氛很浓，关心国家大事，追求新思想、新文化蔚然成风。不少人公开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憎恨，以及对“苏维埃”和十月革命的向往，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拥护和同情。这一切都构成了30年代前期，北海人民追求思想解放、形成社会主义思潮的显著特点，并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一批青年学生骨干直接走上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北海青年学生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中，较深层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在北海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在北海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高潮，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后来北海革命活动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

反复古读经和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

1934年，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为了达到控制人民思想，压制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别出心裁地在学校推行复古读经，规定初中生必须读“四书”，高中生必须读“五经”，《孝经》和《论语》是学生的必修课，还规定“四书五经”课不及格者，一律不准毕业。这种与社会进步和当时形势格格不入的教育措施，理所当然地遭到学生们的抵制和反对。学生们采取“静坐”、

“怠课”等方式表示不满，每到上“读经”课，廉中和合浦一中“未名社”读书会的成员即带头打瞌睡，或看文艺小说，或干脆讨论其他问题。国民党北海当局为了控制学生思想，压制对“读经”课不满的情绪，在全市范围内举行一次政治测验，并出了一道题：“‘读经’是应该反对的吗？”企图通过这样的问答，强制学生“读经”。但出乎意料，大多数学生都在试卷上回答：“‘读经’是应该反对的！”，令反动当局大为恼火。传言出这些学生都是“危险分子”。

1936年，为了对付对“读经”课不满的“危险分子”，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又下令实行全省会考制，以会考限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对新思想的追求，剔除那些“不听话”的学生。但没想到合浦一中学生采取了集体罢考的办法进行抵制，他们提出“集体互助，人人及格”的口号，举行“怠课静坐”、“考试交白卷”，抗议国民党当局提倡的“读书诵经”和“会考”制度。学校当局没有办法，只得给大家及格，学生们以集体的力量又一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

北海青年学生在反对复古读经的同时，各校读书会的骨干还带领学生开展反对法西斯式奴化教育的斗争。1935年至1936年间，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分别开展驱逐训导主任马斋心和反对校长范公镇的斗争。

1935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北海不少青年学生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多次走出校门，到社会上清查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和宣传演讲活动。但马斋心竟骂这些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是“流氓”、“娼妓”，压制学生活动。范公镇却不但准备开除那些反对“读经”的学生，还指使人员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学生实施暴力阻挠。马斋心和范公镇的行为，引起了北海青年学生的公愤，终于暴发了“驱马”和“倒范”运动。廉中和合浦一中的学生先后罢课，向社会发出“告父老书”，揭露学校当局实行法西斯教育，打骂和控制学生思想的劣迹。北海青年学生的行动，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终于迫使马斋心向学生们认了错，范公镇下了台。

北海地区青年学生反对复古读经和“驱马”、“倒范”运动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和青年们追求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表明读书会已从单绝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走上了社会实践。这种实践虽然粗糙和幼稚，但已成了一种有一定号召力的社会政治力量，表现了人们对新思想的追求和愿望。

新文字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读书会逐步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并开始走向社会。利用学校的壁报或自行刻印小报发表时评，在工农群众中办夜校、识字班，扩大抗日宣传，团结教育社会青年。其中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展，所有的读书会都成为这一运动的基本力量。

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左联”文化团体之一）为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与

封锁，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于1933年冬，倡导发动和推广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左翼文化人士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大众文化”和“大众语”的讨论，提出了宣传、教育和鼓励学习汉语拉丁化的问题。之后，提出了学习拉丁化新文学和世界语的倡议，并得到了上海、广州等地文化人士的热烈响应，全国大中城市形成推广拉丁化新文学和世界语的热潮。北海的青年学生在从上海邮寄来的刊物中得知了这一信息，学生中的部分骨干分子如冯德、张文纲等人，首先利用在苏联海参威出版的用新文字排印的小报《我们的世界》和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出版的《SIN WE NZ（新文学）》等刊物进行学习。张文纲还试用新文字翻译廉州土话（客家话语系），起草《合浦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以便更适于本地推广，实行文字改革。1935年暑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达经回到北海，暨同在广州广雅中学就读的林施均（林树棠）、黄万吉等一起，在北海开办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班”，由他们亲自授课，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兴趣盎然地学“新文字”。1936年，赵世尧、黄万吉、冯德等又开办世界语学习班，并成立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以上海左翼世界语联盟提出的“为解放大众而学习世界语”作口号，开展学习新文字和世界语的活动。这个活动无疑在团结进步青年，促进青年思想觉悟，扩大抗日宣传，拉近北海与国内主要进步思想策源地在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距离都有着重要作用。

北海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群众性读书活动和抗日文化运动，不仅形式多样，成效显著，而且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尤其是左翼文化宣传的扩大和加强，在当时的北海各阶层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革命影响；对北海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进步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三、北海九三事件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下，同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两广军阀发动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36年6月1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虽然两广事变实质上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客观上却顺应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因此，两广事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36年7月，蒋介石调动40万军队从粤、湘、黔三面围攻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紧急扩军备战，要同蒋介石战斗到底，得到了全国爱国人士的同情。中共党员宣侠父利用担任广西绥靖署上校咨议之便，按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地做被贬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蔡廷锴的统战工作，推动他们抗日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增强反蒋力量，决定重建以抗日将领蔡廷锴为首的新第十九路军，发出通告号召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到南宁报到，并将到南宁的第十九路军旧部首先编为一个师，番号为六十师，师长由原第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

长翁照垣担任。8月，为了反击蒋介石对广西的包围，抢占出海口，李宗仁、白崇禧命令第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翁照垣部迅速进驻廉州、北海。

六十师到达北海前，先派团长钟俊生到北海与赵世尧、冯德联系，召集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共商配合六十师到北海的抗日救亡事宜，并发动北海民众热烈迎接进驻部队。接着，六十师政治部主任张梅生及政工人员曾眉（共产党员）、翁肇志也到北海，向赵世尧等讲明六十师是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部队，政治部内有进步人士领导。并筹备成立新的北海市政府，拟委钟俊生任市长，赵世尧在市政府教育科工作，负责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赵世尧通知在合浦西场组织读书会工作的黄铸夫以及罗刚（罗秉乾）、朱明（罗秉森）到北海协助他工作。六十师的先头部队及政工队初到北海时，在街头刷写“打倒日寇”、“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标语，市民争先恐后围观，奔走相告，对这支爱国军队刮目相看。以赵世尧、冯德为首的爱国青年走上街头，燃放鞭炮，热烈欢迎六十师的到来。8月底，翁照垣率六十师正式进驻北海，北海各界民众数千人会集于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民众欢迎抗日英雄翁照垣暨抗日救国誓师大会”。会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欢迎抗日英雄十九路军”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给翁照垣以极大的鼓舞；翁照垣和赵世尧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北海各界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坚决抗日。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民示威游行。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华北、西南相继发生了汉奸、日侨和日军被杀或被扣事件，造成了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被动。翁照垣部也想在这方面制造一些事端，逼蒋介石抗日。因此，翁照垣部进驻北海后，逐一对外籍侨民和嫌疑分子进行排查，以消除不利于抗日的人和事。在排查时，英、法、德等国人员嫌疑逐一排除，视点最后落在日侨中野顺三身上。中野顺三早年侨居北海，其妻子是廉州人。中野顺三在北海开一小药房，取名为“丸一药房”，是香港日本丸一药行的支店，主要经营日本制的成药，兼售玩具和其他外国产品。据北海市民反映，中野顺三有间谍嫌疑，他常以打鸟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沿海及钦廉一带，秘密绘制地图和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潮汐等情况。又据北海海关一职员反映，中野顺三一切行动听命于日本政府，“每年受日本政府津贴千元，每星期须向日本政府作一二次报告”。经过调查后，翁照垣与张梅生等认定中野顺三为日本间谍，并决定采取刺杀中野顺三的行动，掀起反日浪潮，逼蒋介石抗日。这时，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到合浦召开军事会议，翁照垣将张梅生收集到有关中野顺三的情报向蔡廷锴作了汇报，并提出刺杀中野顺三的计划，得到了蔡廷锴的默许。接着，翁照垣安排张梅生负责完成刺杀中野顺三这一计划。张梅生从北海驻军中挑选5人，从合浦师部挑选2人，组成便衣行动小组。刺杀中野顺三前一星期，翁照垣召见了北海商会会长，以军事对峙时期，地方情况混乱，为免保护不周，发生意外为由，要求商会会长劝中野顺三限期离境。中野顺三也感到事情不妙，停止营业，深居简出，有离境之意。但这时便衣行动小组已摸清中野顺三的相貌特征和家居情况，准备刺杀中野顺三。9月3日傍晚，刺

杀行动小组7人来到中野顺三药店，留下两人在门外把守，其余5人进入药店，诈称买药，然后径直冲入内室，刺杀了中野顺三。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北海九三事件。

刺杀中野顺三后，翁照垣授意六十师政训处处长陈汉流写了一篇报道，于9月4日在《合浦半周刊》刊出，简单地报道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被刺杀的消息。消息传开后，北海民众议论纷纷，认为中野顺三死有余辜。远在南宁的李宗仁也拍来电报，询问事件真相。陈汉流按照翁照垣事先统一的口径，除将《合浦半周刊》登载的消息重抄一遍外，还加上几句说明：曾为了中野顺三的安全，已劝其离开北海，以避群众怒锋，但中野顺三不从，卒为群众所杀，等等。李宗仁也照此电告了广东当局。与此同时，张梅生到合浦一中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当前局势和布置组织北海抗日救国事宜，决定筹备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救国会，推选赵世尧、吴世光、庞国泰等负责。并派人到码头工会、驳艇工会等处联系，推动成立全市性的抗日救国组织，确定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活动。

几天后，中野顺三被杀的消息在广州、香港等地传开，引起海内外轰动，日本当局立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9月8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召见国民党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询问北海九三事件的情况，并嘱必要时派人调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中村也到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会见了刁作谦，表示日本要派飞机前往调查北海九三事件。刁作谦鉴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敢贸然答应，婉言拒绝。中村又在刁作谦秘书凌士芬陪同下，会见了广东省主席黄慕松，再次表示日本要派军舰调查北海九三事件的强硬态度，黄慕松依然不作正面答复。但蛮横的日本当局却置中国方面的表态于不理，9月9日，日本单方面派遣军舰“嵯峨”号前往北海，刁作谦闻讯感到形势紧迫，也急令凌士芬赶到北海调查。当天下午5时，凌士芬带着随员在黄埔港登上粤海军“福安”号军舰，绕道兼程前进，于9月12日上午9时，先日舰之前抵达北海港，并乘海关的小艇欲登陆，但遭到北海驻军的阻挠，迫凌士芬等回军舰。同时，赵世尧等在张梅生的指导下，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北海各界民众反对蒋介石政府卖国外交政策大会”，发动全市学生、工人、市民数千人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芬到北海调查。后来，翁照垣派陈汉流、张梅生与凌士芬交涉，允许凌士芬等5人登陆。凌士芬一行在陈汉流、张梅生的陪同下，走出海关码头。这时沿中山路一带的街道挤满了示威群众，人人手执写着各种抗日反蒋标语的红绿三角小旗，不断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屈辱外交”、“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口号。凌士芬一行在群众一片抗议声中同北海军政方面的代表：六十师参谋长丘国珍和合浦县代理县长林宗汉举行了谈判。当凌士芬提到日本军舰将至，日方代表将上岸调查时，丘国珍表示，绝不容许日方登岸调查，倘若日本军舰强行登陆，一定予以炮击。谈判过程中，示威群众将市政局围得水泄不通，强烈要求凌士芬出来回答问题。当凌士芬出来回答问题时，示威群众便向凌士芬递交请愿书、抗议书，并欲冲入谈判厅示威。后经丘国珍调解，群众选出赵世尧等7名代表进入谈判厅与凌士芬交涉。群众代表在凌士芬面前慷慨陈词，控诉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杀害我国同胞的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并要求凌士芬一行参加北海群众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但遭到凌士芬的拒绝。因此，谈判不欢而散。凌士芬知道调查无果，便匆匆结束谈判，回到军舰上。示威群众高呼口号，一路尾随，凌士芬一行狼狈不堪。凌士芬返航的“福安”号与日本军舰“嵯峨”号相遇，告知北海军民实情，劝阻“嵯峨”号驶往北海。“嵯峨”号上的日本人知情后，也深知“调查”难于进行，于是“嵯峨”号与“福安”号一起离开了北海。

北海九三事件也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方面认为事态严重，9月10日，东京各报均刊登了北海九三事件的消息，极尽煽动之能事；日本右翼组织的强硬派代表便晋谒了日本首相广田、外相有田，并质问道：“何不占领海南岛，以保障该处日侨之安全？”公然发出了战争叫嚣。日本海军中央部接到日舰“嵯峨”号拍回的第十九路军拒绝日舰登岸调查的电报后，于9月14日举行海军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方面施以强硬态度。于是日本海军巡洋舰“球摩”号，一等驱逐舰“太刀风”号，二等驱逐舰“基竹”号、“刈萱”号、“朝歌”号、“芙蓉”号等6艘军舰驶向北海。同时，日本方面又加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压力。

9月中旬，形势剧变。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下台，余汉谋被蒋介石委任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利诱收买下，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也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发出和平通电，与蒋介石妥协。9月15日，李宗仁电令第十九路军六十师撤出北海。蒋介石指令粤军余汉谋部谭邃、巫剑雄一五九师进驻北海。9月21日，一五九师进驻北海，六十师撤出北海，双方举行了交接仪式。

在六十师撤出北海之前，张梅生到合浦一中召集赵世尧等学生骨干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张梅生指出：(1)蒋介石利用广东军打第十九路军，六十师如不撤出北海，双方火拼，对抗日反蒋不利。(2)六十师计划撤往十万大山，开辟武装抗日根据地。(3)要求动员一批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参军，充实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力量。(4)要求留在北海的青年学生多做群众工作，深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以备第十九路军回师反击之需。会后，北海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踊跃参军，成立了一个随军的学生队，与香港进步青年曾眉、张凤楼等一起在六十师师部政工队工作。

凌士芬于9月15日返广州后，正拟向蒋介石汇报调查情况，便接广州当局通报，说一五九师正向北海推进，第十九路军准备撤出北海。日本方面也接到了六十师准备撤出北海的消息。于是，凌士芬等便奉命与日本调查员分别乘坐粤海军军舰“福安”号、“通济”号和日本军舰“嵯峨”号一起再赴北海调查。9月17日起航，9月19日晨抵达北海，停泊在冠头岭外，等待六十师撤出北海。先期到达北海的日本海军6艘军舰则在北海海面游弋，进行武力威胁。9月21日，在“嵯峨”号上的日本调查员得到日本驻南京的武官明确电告“翁师撤走，粤军接防”。9月22日，一五九师参谋长许让玄和北海绅士刘瑞图乘坐海关小艇到“福安”号军舰会见凌士芬，告知凌士芬六十师已撤出北海，一五九师已进驻北海。并到日本军舰“嵯峨”号会见日本调查员，对日方作出了约束，规定：(1)只许“嵯峨”号人员登岸，并须列出登岸人

员名单，待中方通知后才得登岸调查；(2)日方登岸人员不许配备武装及携带照相机；(3)调查时，须按中方线路进行。日方无奈，只得允诺。9月23日，日本调查员与凌士芬一行在许让玄和刘瑞图的陪同下登岸北海，开展对北海九三事件的调查。

日方人员上岸调查时，北海驻军沿路警戒，戒备森严。日方人员乘坐的汽车也用木板将窗户盖住，使日方人员不得窥视沿途情况。在调查中，日方人员除询问北海警察局及有关人员外，还询问了中野顺三的妻女和外籍人士，最后开棺验尸，并带走了中野顺三的3本日记及7封书信。9月24日傍晚，日方人员携带中野顺三的骨灰及其遗属返回日本军舰“嗟峨”号，与其余6艘日本海军军舰相继离开北海。

随后，日本方面就北海九三事件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广东余汉谋当局进行了频繁的外交磋商。9月28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谈话，称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反日事件，“其中数件事为共产党图谋离间中日关系……现即应采取断然步骤，除其根患……”并提出“中日合作制止共产党活动实属必要”。这是日本以“共同反共”为幌子，企图拉拢蒋介石，因而对北海九三事件就不太苛求了。

蒋介石鉴于当时情势，一方面安抚日本人，嘱其不要急躁行事，以免共产党从中利用；另一方面则抓紧解决广西问题，对李宗仁、白崇禧又拉又压，逼令他们调走了六十师，又解散第十九路军。此后，北海九三事件又经过多次交涉，直至12月31日，中日双方才正式结案。国民党政府除向日本方面“深表歉意”外，还给予中野顺三遗属3万银元抚恤费。轰动一时的北海九三事件遂告结束。

北海九三事件是北海军民采取的一次抗日救亡行动，也是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与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紧密相连。北海九三事件轰动全国，中国和日本为此事件外交活动频繁，国内外主要报刊连续登载，毛泽东曾将其与成都事件一起提及，称为新的抗日浪潮。北海九三事件产生的原因及其背景虽然复杂，但它顺应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潮流，在全国特别是北海掀起又一个抗日高潮。

北海九三事件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造成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困难，极大地促进了北海人民的觉醒，振奋了北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掀起了抗日反蒋、逼蒋抗日的热潮，标志着北海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北海九三事件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为抗日战争和北海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北海九三事件是动员全市人民抗日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日的思想、准备了抗日的人心、准备了抗日的干部，对北海地区民众的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抗击国民党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北海九三事件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以维持其在钦廉四属的统治。首先，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李宗仁施加的压力下被迫改编，李济深、蔡廷锴等抗日将领被迫寓居香港。其次，六十师将领翁照垣、丘兆琛、丘国珍等被解职。因此，大大削弱了钦廉地区的抗日救亡力量。

第十九路军六十师撤离北海时，中共党员杜渐蓬自广州专程返合浦找赵世尧了解北海九三事件的全过程。随后，杜渐蓬与赵世尧、翁绍志（六十师留下的善后人员）、韩师琪等在合浦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北海九三事变后的形势，决定赵世尧去广州，黄铸夫回西场，保持通讯联络。参加第十九路军政工队的一批北海进步青年学生随军两撤，伺机留驻十万大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王文岂等30余名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在张梅生率领下撤到钦州，由宣侠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但第十九路军被迫改编后，这批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只好返回北海地区。

一五九师进驻北海后，立即对北海九三事件的积极分子及随第十九路军西撤的进步青年学生进行调查，主要是追查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组织以及遏制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五九师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自从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北海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最为活跃，如举行示威游行、大唱抗日革命歌曲、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事政治等。西安事变后，北海青年学生以大字报形式，把有关西安事变消息和国外通讯社发表的有关共产党和张学良将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张贴街头，还以“抓住蒋介石怎么办”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两广事变中，北海青年学生拥护抗日反蒋的第十九路军进驻北海，并积极与其配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北海九三事件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到北海调查时，北海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同第十九路军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一五九师进驻北海后，北海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依然继续进行，各班所组织的读书会仍然继续活动。这时，合浦一中训育主任马斋心的思想比较反动，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合浦一中各班的读书会活动以及所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但很不满意。后来，马斋心发现有人利用传达室接收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行机关寄来的刊物和传单，怀疑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立即将此事报告一五九师。因此，一五九师决定对合浦一中学生采取逮捕行动。

1937年1月7日上午，一五九师的大批军警包围了合浦一中，从各个教室里分别逮捕了陈广才、吴世光、岑嘉毅、利培源、张家保、庞自、伍朝汉等10多人。1月8日，在廉州的张文纲、常乐的李士环、北海三小的教师冯德也都被捕，还逮捕了随六十师西撤刚返回的北海进步青年。这次被捕的学生都是读书会的成员。同时，还发出通缉令，缉捕赵世尧、黄铸夫等。赵世尧、黄铸夫等被迫转移到广州、香港。从此，北海的读书会活动进入低潮。

被捕的青年学生被关押在一五九师九五〇团团部后，敌人对青年学生进行了审讯和训话，并攻击共产党捣乱，说什么第十九路军和张学良都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对敌人的审讯和训话，

青年学生或是据理力争，或是反唇相讥，或是义正词严予以驳斥。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捕青年学生是共产党员（事实上当时他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加上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抗日救亡形势的新发展，这批被捕的青年学生被拘禁了四五个月之后，相继得到释放。国民党镇压北海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行动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经过这次被捕事件，使被捕的青年学生都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现实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大部分人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重建后，加入了共产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同时，使北海青年学生认识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联共抗日条件，但是国民党仍然一心只想反共，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从而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九一八事变后，北海进步青年学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积极参与抗日反蒋活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抗日救国热情；北海抗日救亡运动从自发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逐渐发展到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有组织、有目的的抗日民族斗争，促进了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后来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奠定了基础。同时，北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重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干部基础，使北海党组织重建的条件日趋成熟。

[1]据黄铸夫回忆，关于董必武表扬合浦党的工作的两次谈话，分别于1938年、1939年在南方局一个报告会之后和与黄铸夫个人提及。

[2]罗文洪于1983年在广州党史座谈会上指出，他与邹瑜于1973年作过统计，全国抗战后仅他们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学达28人，超过半数。